

反對派濫用司法覆核嚴重傷害法治和經濟民生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楊志強

反對派濫用司法覆核，把經濟民生事務政治化，使司法覆核淪為政治工具，不僅對法治精神構成嚴重損害，而且阻礙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終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曾多次表示，司法覆核並非解決所有經濟、民生問題的萬應靈丹，呼籲有關問題應該在社會其他平台解決。終院前非常任法官列顯倫認為政府並無違法，仍然遭到挑戰，是有人濫用了司法覆核，本港應該堵塞法律漏洞，避免司法覆核氾濫無休，以維護法治和社會總體利益。

回歸以來，反對派屢屢濫用司法覆核，從吳嘉玲案、莊豐源案、外傭居留權案、港珠澳大橋案，以及針對立法會主席和財委會主席的剪布權的司法覆核等，使政治、經濟、民生等眾多問題高度政治化，嚴重傷害法治和經濟民生，製造了社會嚴重撕裂，政爭無日無之，亦損耗天文數字的公帑。

公民黨屢次操控司法覆核「包攬訴訟」

令市民感到擔憂和氣憤的是，回歸以來的司法覆核，背後大多數都有熟悉法律的政黨和政客在操弄，令司法覆核不但完全喪失監察政府的本意和作用，反而加劇社會的矛盾，犧牲社會的整體利益，反對派濫用司法覆核是對法治精神和經濟民生的傷害。

回歸以來，公民黨屢次操控司法覆核「包攬訴訟」。例如，1999年1月29日的吳嘉玲司法覆核案，引發了可能釀成160萬內地移民湧港的嚴重危機，幸

人大釋法得以化解。此案代表吳嘉玲的大狀是公民黨核心成員張健利，以及與公民黨關係友好的戴啟思、郭瑞熙；2001年7月的莊豐源司法覆核案，代表莊豐源的大狀是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李志喜及郭瑞熙，莊案令大量內地孕婦湧港產子，一度對本港醫院的婦產科、兒科、母嬰健康院以至人口政策和社會福利造成嚴重影響。

2011年4月的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協助朱婆婆提出司法覆核的律師黃鶴鳴是公民黨執委，代表朱婆婆的大狀戴啟思與公民黨關係友好，他在這宗官司的副手大律師郭榮鏗是公民黨執委。2011年9月的「外傭居留權案」，負責官司的大狀還是公民黨核心成員李志喜，另一個主要角色帝理邁也是公民黨創黨黨員。

濫用司法覆核使港珠澳大橋成本上升88億元

2011年4月的「港珠澳大橋案」，協助朱婆婆提出司

法覆核的律師黃鶴鳴是公民黨執委，代表朱婆婆的大狀戴啟思與公民黨關係友好，他在這宗官司的副手大律師郭榮鏗是公民黨執委。朱婆婆證實是有人叫她打官司，「我唔係有心搞，不過，他們（公民黨）同我講，我又『睇查』，我老人家懂什麼？」公民黨大狀聞言方寸大亂，不但拒絕公開對質，還誣衊朱婆婆「唔識講野」。

公民黨或公民黨的「友好大狀」多次利用司法覆核製造「居港權案」，以及公民黨幕後操控司法覆核狙擊港珠澳大橋，是如出一轍的慣性。反對派濫用司法覆核，社會代價沉重，僅舉港珠澳大橋環評案為例，大橋工程最終延誤兩年，工程成本因而急升88億元，即使不計有關連道路工程費用的上漲，大橋工程完成後因連連延遲遲不能接駁，大橋也就無法發揮各方面的效益，其損失更是難以估算。

反對派企圖令禍港殃民的拉布合法化

梁國雄、黃毓民等反對派議員多番就剪布提出司法覆核，企圖令無休無止的拉布合法化，徹底癱瘓議會，阻遏政府施政。例如，香港高鐵自2009年由行政會議拍板興建後，就被反對派議員「拉布」阻止撥款，「拉布」議員無所不用其極，不單對同一問題重

複提問，還提出一些荒謬、無聊的提問。這次「拉布」從2009年12月一直到2010年1月，使高鐵撥款議案最終延至2010年1月中旬才獲通過，但整個項目成本由2008年預計的395億元大幅上升至900億元。

令人憂慮的是，「拉布」已經由過去針對重大法案及預算案，蔓延到立法會各個事務委員會，反對派議員無日無之的「拉布」，嚴重拖累經濟民生。尤其是每年的財政預算案審議，反對派都必提出大量無聊、瑣碎、重複的修訂意向拉布，導致多項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措施接連受阻。

梁國雄、黃毓民等反對派議員多番就剪布提出司法覆核，但法庭在2012年和2014年明確判決，基本法有關賦予立法會議員參與立法會立法程序權利的條文，並不是給予個別議員根據個人意願任意行使權利干擾會議，立法會主席和財委會主席有權主持會議，包括以剪布去控制會議進度。

本港各界應反思檢討濫用司法覆核的問題，應該堵塞法律漏洞，在司法覆核門檻由法官決定的前提下，可檢討法律觀點和執行上能否進一步完善制度，法官也不應濫批、濫審司法覆核，避免司法覆核氾濫無休，以維護法治和社會總體利益。

公民黨以「車上檢」刁難「一地兩檢」

楊正剛

選舉不能靠「口水」不流汗水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文滿林

高鐵「一地兩檢」鬧得紛紛擾擾，公民黨一向最落力反對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境內進行「一地兩檢」，昨日卻提出折衷辦法：建議以上車查檢的方法，以「車上檢」代替「一地兩檢」，避免了內地執法人員越境執法的爭議。廣深港高鐵行車時間短，「車上檢」根本不可行，又存在更難以解決的法律問題，公民黨一眾法律「藍血人」不會不知道當中蹊蹺，故意借「車上檢」刁難「一地兩檢」，是要使拒絕「一地兩檢」名正言順，別人再堅持在香港實施「一地兩檢」就顯得不講道理，還不是別有用心破壞「一國兩制」？

公民黨提出的「車上檢」，目前在芬蘭赫爾辛基來往俄羅斯聖彼得堡的列車上實行，在列車上由俄芬兩方人員辦理出入境手續。可是，公民黨沒有告訴公眾，芬蘭赫爾辛基來往俄羅斯聖彼得堡的車程時間是3.5小時；廣深港高鐵車程只需要45分鐘，載客量以千計，如何能夠完成乘客的出入境手續呢？如果能的話，有多少人才能做到？一對一？一半乘客，一半執法人員？公民黨要製造世界鐵路史的奇觀，還是笑話？

更可笑的是，公民黨舉例，以列北上的高鐵列車可載580名乘客，其中大約一半在福田站下車計算，只要車上有20名內地執法人員，便可以在列車抵達廣州南站前，為其檢閱200多名旅客完成車上查檢的工作。高鐵的特點是快，廣深港高鐵路線內地高鐵路網，從香港乘高鐵出發的乘客，當然是為了去更遠的地方，怎麼可能有一半人、近300乘客，會在深圳福田就下車呢？現在香港乘港鐵、巴士去深圳又快又便宜，乘高鐵去深圳？公民黨的說法

不怕笑掉人大牙。「車上檢」還有更複雜的法律問題，如果有乘客在高鐵上才被發現是禁止出境或入境，抵港或抵內地後又如何安排遣返？公民黨的建議對此隻字不提。公民黨的大狀們不會把這麼重要的問題都漏了吧，如果真的漏了，以這麼疏忽大意的態度，與大狀嚴謹慎密的要求和形象不相符，替人打官司恐怕「十賭九輸」；如果不是無心之失，那是否故意留下陷阱，若高鐵真的採用「車上檢」，未來兩地在執法上一定會遇上大爭拗，惹上大麻煩。

在香港落實「一地兩檢」是高鐵成功與否的關鍵問題，沒有「一地兩檢」，高鐵就是「廢鐵」。美加、歐洲都有「一地兩檢」，「兩國兩制」下都毫無問題，為什麼香港在「一國兩制」，「一地兩檢」卻變成某些人口中的「洪水猛獸」？余若薇說，「一地兩檢」不純粹是車速效率問題，而是打破「一國兩制」的藉口。郭榮鏗指，以基本法附件三處理「一地兩檢」問題是「自毀長城」及「扭曲基本法原意」。前幾天，公民黨創黨黨員及創黨副主席黎廣德才說，「高鐵不停建，兩制不能保。」

總而言之，公民黨心目中認定，接受「一地兩檢」，就是打破「一國兩制」的壁壘，就是令香港法治「自毀長城」。寧願高鐵爛尾，也不要「一地兩檢」，這就是公民黨「車上檢」的潛台詞。「車上檢」只是虛晃一槍，好粉飾一下公民黨還是講道理的，不是「沒有彎轉的」。實際上，一眾公民黨精英們巴不得高鐵「爛尾」收場，讓香港出大洋相。

反對派的議席得失和選票增減，很大程度反映了選民對「佔中」的反感和不滿，對那些標榜所謂「佔中」和趕客之「本土派」的參選者都不會支持。「傘兵」刻意淡化「佔中」色彩，瞞天過海欺騙到不少選民，才有50個「傘兵」落區參選意外有8人當選。若他們夠膽打着「佔中」旗號，大有可能連一個議席都撈不到。

區選之後，距離明年之立法會選舉只有10個月時間，區選就是立法會選舉的前哨戰，能贏得區議會大多數議席，這對立法會選舉有莫大關係，起碼在地區上有扎實「樁腳」也。選票是由一個屋宇、一個地區匯集起來的，才能贏得議席，尤其是5個「超級區議會議席」，由全港選民一人一票投票的，這更凸顯區議員及「樁腳」的重要性，區議員及大眾當然希望更多新人參選，尤其是年輕人。問題是，新人或年輕人當選，能不能全心全意投入社區工作才是關鍵。怕只怕這些新當選的年輕人，心不在此，而志在明年的立法會，區議會只作跳板。

更值得注意，當選的「傘兵」，會否只見議員辦事處而不見人影。因為這些「傘兵」當選，都是靠「口水」多過汗水，在當選之區沒有做過什麼實質工作，只在選前進行「口水」宣傳攻勢，一面抹黑和攻擊對手，一面就猛開「空頭支票」，承諾樣樣都搞掂。如今當選之後又如何，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建制派與

區選啟示與展望

藍鴻震 博士 前民政事務局長 國際專業管理學會會長



藍鴻震

這次的區議會選舉，建制派打破了所謂高投票率不利建制派的「定律」，再次證明以「佔領行動」及激進行動作龐大政治動員，對區選結果雖然有一定影響，但效用遠不如想像中之大。相反社會上沉默的大多數對反對派政黨產生反感，從而形成一個政治反動員，壯大了建制派的票源。但部分反對派或「傘兵」的空降參選人仍然取得對建制派參選人有威脅的票數，這些參選人及其支持者將對以後的區選或來年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以及明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帶來一定變數，必須引起重視。

打破高投票率「魔咒」

今屆區議會選舉投票人數自2003年以來的新高，投票率達47%，可謂令人鼓舞，但隨之而來的選舉結果卻令部分黨派及其支持者有震驚之感：四位不同黨派的明星級雙料現任議員下馬，亦有較出名的政黨明星挑戰失敗。與此同時，卻有不少年輕的新面孔當選，甚至被稱為「傘兵」的年輕人也奪得數席，於是也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不同解讀。

區選之前，反對派的支持者表示受到「佔領行動」的號召，要把政治議題及年輕聲音帶入區議會，同時呼籲剛滿18歲的市民盡快登記做選民。亦有支持反對派的學者表示，反對派之所以在歷屆區議會選舉被建制派大比數擊敗，原因在於很多在立法會選舉投票給反對派的選民，從不在區議會選舉投票，因此呼籲這部分選民出來投票，扭轉選舉結果。然而，此次在高投票率下，反對派依然還是處於劣勢，上述這些因素並未發揮到反對派原先預測的影響。

首先，在「佔領行動」如此大的政治動員下，這次反對派並沒有如2003年一樣與建制派幾乎平分秋色。在431個民選議席中，反對派只獲得不足三成，而建制陣營最終獲得299席，議席雖微跌5%，但仍保持多數。根據選舉事務處資料，今年有約26萬新登記選民，佔登記選民總人數近兩成，但建制陣營所得的票數比上屆仍有約11萬的增幅，相對反對派只有約3萬的增幅。其次，來自包括「熱心公民」、「人民力量」及社民連，或者早前參與「反水貨」行動的較激進參選人，在今次選舉中全軍覆沒，再次證明「佔領行動」及激進行動作為反對派的龐大政治動員，對區選結果雖然有一定影響，但卻遠不如想像中的大。

「傘兵」和「政治素人」夾擊立會選舉

事實上，自「佔領行動」後，不少沉默及政治冷感的市民對反對派政黨產生反感，從而形成一個政治反動員，壯大了建制派的票源。由此可見，「佔中」對選民意向的影響

並非單方面。縱然如此，我們仍然不能不提一點，就是在見證過「佔領行動」的各種不良影響後，不同社區仍然存在一定數量的市民支持反對派及激進派別。眾所周知，區議會選舉的本質是以地區議題為主，反對派或「傘兵」在地區挑戰建制派，往往在地區議題上會被比下去，而空降的參選人就更不被看好，但在這樣的情況下，部分反對派或「傘兵」的空降參選人仍然取得對建制派參選人有威脅的票數，這些參選人及其支持者將對以後的區選或來年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以及明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帶來一定變數。

筆者認為，今屆區議會選舉同時帶出一個訊息，就是選民可能對現時部分較資深的區議員存有不滿。這種不滿是跨黨派的，從不論是建制派或反對派均有資深的區議員被新來的挑戰者擊敗就可觀察到。選民希望政壇有新氣象，希望一代新人勝舊人，對於這一點，建制派和反對派政黨也有需要反思。有人認為，區議會變得政治化，但筆者相信候選人要在區議會選舉獲得市民持續的支持，始終十分倚重實幹及堅實的地區工作。不論是連任議員或首次當選的新議員，過分強調政治化的效應始終會隨着時間淡化，各位大可放長雙眼看看。

張敬偉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從「入世」到「入籃」 中國機遇和挑戰並存

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佈，批准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決議將於2016年10月1日起生效。批准人民幣加入SDR或將使更多國家得以放心地將人民幣納入自己的外匯儲備。據了解，當前的SDR籃子貨幣包括美元、歐元、日圓和英鎊。人民幣成功「入籃」，堪稱水到渠成，可謂量化促成質變。中國經濟高速增长，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外匯儲備全球第一大國，當然還是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這是中國宏大的經濟在全球經濟危機中起到了壓艙石的作用。

IMF與時俱進的選擇

新秩序的力量已經無可阻擋。傳統機構要麼接納、融合新成員成就全球新秩序或新的全球治理機構，要麼排斥倒退回中國等新生市場另起爐灶，IMF選擇了與時俱進。

今年早些時候，IMF對人民幣「入籃」還抱持謹慎態度，不確信人民幣「入籃」能夠突破「可自由兌換」的屋頂。然而不久前，IMF對人民幣「入籃」重建信心。尤其是在8月下旬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嘗試市場化改革之時，伴隨着中國股市的動盪，包括美國、歐洲和新興市場在內的大多數經濟體，對中國的舉動感到惶恐、疑慮。其懷疑中國是以人民幣貶值的方式，來提振出口和挽救資本市場的頹勢。IMF和它的掌門人拉加德慧眼獨具，認為人民幣匯率改革值得肯定。

之後，雖然IMF對討論人民幣「入籃」的議程有所反覆，但上月稍早時候，拉加德給世界篤定的答覆，人民幣符合「可自由使用」貨幣要求。這意味人民幣「入籃」已成定局。更重要的是，歐洲國家的支持和日本的謹慎支持，以及美國的「不反對」，使得人民幣「入籃」順理成章。

人民幣「入籃」具有象徵和實質兩重意義。前者，即如拉加德所言：「（人民幣『入籃』是將中國經濟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也是對中國過去幾年貨幣與金融體系改革的肯定。」簡言之，人民幣需要「入籃」成為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重要角色」，IMF也需要人民幣這個具有活力的「準全球貨幣」。在SDR「籃子」裡，曾有20種貨幣，5年一審可謂大浪淘沙。算上人民幣，新的SDR「籃子」裡按照權重還有美元（41.73%）、歐元（30.93%）、日圓（8.33%）和英鎊（8.09%）。人民幣的權重（10.92%）則超越日圓和英鎊排在第3位。由此亦可看出，這一權重排序，是全球經濟實力的真實體現，也意味全球金融治理的新變局，作為新興市場的中國成為全球金融治理中的重要一員。

實質意義，輿論場有多重解讀。央行副行長易綱的6字訣意味深長：喜悅、平靜、謙虛。的確，人民幣「入籃」不是為中國爭取宏大的虛名，而是中國融入全球經濟治理的必要舉措。從「入世」（加入WTO）到「入籃」，中國每走一步都是在艱難地「擁抱世界」，哪怕這個世界給予的不是溫情而是冷漠。內中邏輯很清晰，中國要成為全球大國，必須要成為全球秩序中的一員，而前提是通過遵守全球規則成為負責任、有分量的一員。只有贏得世界的信任和主要成員的認可，方能成為重要一員，從而使老秩序發生變革，朝着新秩序的路徑前行。

金融改革任務艱巨

就此而言，人民幣「入籃」是世界對中國實力的確認，「入籃」是機遇但更多的是挑戰。就機遇而言：一是能夠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使人民幣真正成為世界貨幣和

IMF成員國官方貨幣，使人民幣進入「五強」貨幣之列。二是作為SDR籃子裡的第三貨幣，將使各國央行和投資者加大對人民幣資產的配置，使人民幣成為各國外匯儲備的新選擇。三是作為隨着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步伐加快，人民幣在SDR籃子中權重趨向上升，人民幣或成為全球流通的真正「硬通貨」。此外，對中國股市、債市，走出去的自然人市場主體，「行天下」更具資金（本）自信。

挑戰更迫切。人民幣「入籃」只是第一步，要成為真正的全球儲備貨幣還有漫長之路要走。「可自由使用」不僅是IMF的定性或中國央行的政策宣示，還要靠全球市場的定實踐以及國際社會的評價來斷定。現階段乃至未來一段時間，人民幣依然會維持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真正實現人民幣匯率的自由浮動，還需要時間。世界看中國對人民幣的要求，及金融改革的要求是急切和苛刻的。兩種立場交鋒必然會產生齟齬，加之未來不確定性的其他博弈因素的滋擾，人民幣「入籃」不是萬事大吉，而是中國邁進全球金融秩序後荆棘之途的開始。

何況，5年一審的動態體制，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節奏等等，都會使人民幣面臨更嚴苛挑戰。



人民幣「入籃」是將中國經濟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里程碑。